

从会计信息产权谈国有企业全民治理

贤成毅(博士)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 本文基于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为全民所有,提出了全民治理的概念,阐述了全民治理与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的关系,分析了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全民)的监督动力在于全民的异质性。

【关键词】 国有企业 会计信息产权 全民治理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的初始股东——全民的股东权利一直被忽视,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明晰化在于“还权于民”,并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全民治理。国有制下的全民治理,比共同治理更广泛,因国有制下每个不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公民都是利益相关者。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没有与国家(或其他主体)谈判及订立契约、履行契约的行为能力,全民所有制下终极所有者与一级代理人国家的关系不是一种契约关系。

一、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的明晰化:还权于民

1. 全民治理机制:产权舆论监督。在以私有产权为主体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完善的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机制。间接监督机制对企业代理人(经理层)的激励和约束主要是通过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来发生作用的。直接监督机制就是“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即私有企业的股东(委托人)如果对企业代理人(经理层)的经营状况不满,可以在股东大会上通过“用手投票”来改选不称职的经理人员,或通过股票市场上抛售股票来退出。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机制是互为补充的,委托人之所以行使其直接监督权(“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是因为间接监督机制(完善的竞争性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为其提供了甄别代理人(经理层)是否称职的依据,解雇不称职的经理人员后可以及时找到合适的替换人选。

而在我国,国有制的本质特征(国有资产不能在个人之间进行分割和转让)决定了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即全民无法退出,“用脚投票”机制不存在。国有制也决定了无法保证每个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都拥有罢免不称职代理人(经理层)的相应投票权,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不拥有“用手投票”的权利,“用手投票”机制也不存在。全民所有制决定了他们没有“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直接监督权力,但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的身份决定了其具有监督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代理人的权力。现实中肯定还存在另一种监督机制来实现他们的监督权力,那就是舆论监督,他们关心国有资产和监督国有企业代理人的权力就变成了另一种更为间接的监督权力。我们这里所说的舆论监督与一般所说的舆论监督不同,

一般的舆论监督很宽泛,它包括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对食品安全的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舆论监督等,而我们所说的产权舆论监督是产权视角下的舆论监督,是与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的初始产权相联系的,产权舆论监督是替代全民所有制所缺乏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更为间接的监督,因为产权舆论监督必须通过国有企业初始代理人(国家)才能发生作用。这样,在私有制下委托人具有的直接监督变成了国有制下的另一种间接监督,国有制下,社会提供给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的是双重间接监督机制。全民治理主要是指全民的产权舆论监督。

2. 全民治理与会计信息产权。由于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了确保实现对代理方的监督和激励,委托方就必须取得充分的信息,因为监督需要信息,而激励可以促使代理方提供信息。企业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会计信息主要反映一个企业特定时日的财务状况、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净流量情况,因此可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这样,以财务报告体系作为媒介传递的会计信息是衡量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相匹配、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的关键变量,而全民治理更是需要信息。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的明晰化实际上就是对非上市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相应的披露,把会计信息产权“还权于民”,还权于真正的股东(全民),在改善“代理人治理”的基础上,增加全民治理。樊纲等(1994)认为,在国有制关系中,任何一个人既是所有者又是非所有者的全民所有制必然导致“国家所有制”。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多重博弈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我国政府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用之于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因此全民与国家的关系存在隐含的契约关系,是一种默认契约,这种默认契约是国家合法性存在的基础,也是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还权于民”的法理性基础。

二、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的监督动力:全民的异质性

国有制下的全民治理,是真正的股东至上主义治理,但它比利益相关者治理更广泛,因国有制下每个不被剥夺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的公民都是利益相关者,而不是仅限于利益相关者所谓的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债权人、管理者及员工、供

应商和顾客、政府等。全民很抽象,但最实际,全民实实在在地承担了相应的甚至超额的改革成本(财务结果),包括国有企业的决策效率成本、历史遗留成本、政策性负担成本。俗话说“国有企业吃财政,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股市”。“吃财政”实际上就是直接由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承担改革成本,“吃银行”和“吃股市”则是由全民间接承担成本。

主流经济学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研究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是,全民是同质的,在关心国有资产和监督代理人上都具有“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行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假定全民是同质的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因为在“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将一切物质资本和财务资本都归“公有”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代理人几乎没有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也只能享受平均分配主义下的等级工资收入,因此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无须也无必要去监督国有企业代理人。

然而,在合法承认个人人力资本产权、承认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新制度环境下,继续假定全民是同质的,显然不符合现实情况。我们假定“全民是非同质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全民在许多场合必须以整体出现,如全民是作为整体把资产委托给国家经营的,全民是作为整体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结果进行承担的。整体与同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非同质的或同质的众多个体都可以组成一个整体,整体既可以包含同质的个体,也可以包含非同质的个体。全民是非同质的也不表示全民中个体对国有资产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在国有制下,任何全民中的个体对国有资产的权利是一致的、平等的,全民的非同质主要表现在个体的行为意图、行为目的及行为能力的不同上),并按个体的行为意图、行为目的及行为能力的不同对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进行分类:①一般性个体(N_1)对国有资产不关心。部分人有行为能力,部分人没有行为能力。②责任导向的个体(N_2)出于良心与责任感,较关心国有资产,具有行为能力。③利益导向的个体(N_3)出于个体利益目的,较关心国有资产,具有行为能力。④利益和责任混合型的个体(N_4)从责任和利益出发,较关心国有资产,具有行为能力。而且不同类别的个体权利是平等的,个体随着其责任、知识能力、个人利益的变化可以在类与类之间转化。

N_1 类全民还可进一步细分为 N_{11} 类全民、 N_{12} 类全民和 N_{13} 类全民。 N_{11} 类全民主观上对国有资产不感兴趣,但其有关心国有资产的行为能力; N_{12} 类全民和 N_{13} 类全民既无关心国有资产的能力,主观上也不关心国有资产。全民关心国有资产会给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代理人带来监督压力、给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代理人带来经营压力,因而全民关心国有资产对各级代理人也是一种监督。

我们把关心国有资产的行为能力定义为个体具有读书看报能力,并能通过各种渠道来搜集关于国有资产的关键信息,能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甄别、加工、解读,进而发出一些声音,

如发表一些关于国有资产管理好坏,“外部人”和“内部人”是否尽职尽责,是否有偷懒或机会主义行为的评论。

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N_1 类全民仍然适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分析结论, N_1 类全民对国有资产不会采取任何产权舆论监督。 N_2 类全民关心国有资产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关心国有资产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精神效用(非物质效用)。 N_3 类全民关心国有资产是因为国有资产虽然不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物质效用(他们付出了关心国有资产的努力,也无法索取、分割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国有资产),但是会给他们带来间接的个人利益或物质效用。如媒体人员经过调查、研究,揭发和披露了许多重大的经济金融诈骗和金融违规事件,他们关心国有资产努力的回报是间接的,全民给予他们回报的方式是多购买他们发行的报刊、杂志或研究报告。 N_4 类全民包括一些研究人员、媒体人员、证券分析师等,他们关心国有资产,既想出名,也想得到间接回报。我们的分析表明, N_2 类全民、 N_3 类全民、 N_4 类全民具有监督国有企业代理人的动力。

三、结论

国有企业治理失效的原因在于内部人控制或外部人控制,“内部人”是国有企业管理层次上的代理人,“外部人”是国有企业行政管理层次上的代理人,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治理失效的原因在于代理人制约机制失效。本文分析显示,在利益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并非所有的国有企业初始委托人在监督国有企业各级代理人上都具有“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行为”。“蓝田神话”的破灭既不是股东治理的结果,也不是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结果,而是全民治理的结果。银广夏事件、东方电子事件,全民的产权舆论监督(全民治理)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全民治理是防止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控制的重要机制,也是遏制虚假会计信息和财务舞弊的根本机制。因此,如何把非上市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给其初始委托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改革要彻底和完善,全民治理必不可少,只有将“代理人改革”和全民治理相结合才会事半功倍。

主要参考文献

1. 杜兴强.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的畸形性及其解读.会计研究,2003;2
2. 雷光勇,王玮.分配权能对应与会计行为异化.会计研究,2005;4
3. 李连华.产权会计理论学派及其治理政策.财经论丛,2004;2
4. 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 禹来.国有企业的外部人控制问题.管理世界,2002;2